

南洋風起：

《南洋研究》與《南洋情報》的地誌書寫 (1928-1944)

黃國華^{*}

摘要

1927年，上海暨南大學設置南洋研究機構「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接連出版《南洋研究》、《南洋情報》與《中南情報》等關注南洋問題的刊物。在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危機時刻，一群中國學人把注意力投向被西方殖民的南洋群島。本文試圖解析二戰結束前中國知識分子凝視南洋的動因、過程和意義，從上海暨大《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的南洋風土志和遊記，觀察他們如何透過「想像的異邦」建構「想像的中華共同體」，回應晚清民國以來「中國殖民南洋論」政治話語。本文發現這群南洋地誌書寫者，一方面藉由女性化、野獸化和黏膩化南洋，嚴辨華夷界限，修復早已崩裂的天下觀；一方面強調中國與南洋在血緣和語言上同出一源，還有鄭和創造南洋風土，模糊華夷界限，自行擴大中國在南方的影響範圍。兩種書寫策

^{*} 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暨博士生。

略，旨在唯心地把南洋收編在中國之內，由此獲得抵抗西洋與東洋殖民帝國主義的心理力量。

關鍵詞：《南洋研究》、《南洋情報》、暨南大學、風土、南洋

The Rise of Nanyang Studies:

Topography Writings in *Nanyang Yanjiu* and *Nanyang Qingbao* (1928-1944)

Kok-hwa Ng^{*}

Abstract

In 1927, Jin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established the Department of Nanya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a Na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which released a succession of publications focusing on Nanyang issues, including *Nanyang Yanjiu* 《南洋研究》, *Nanyang Qingbao* 《南洋情報》, and *Zhongnan Qingbao* 《中南情報》. At a time of crisis when China was confronted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a group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Nanyang islands which had been colonized by the Wes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motivation, process,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concern for Nanya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Based on the Nanyang-related topography writings and travelogues in *Nanyang Yanjiu* and *Nanyang Qingbao* published by Jinan University, the study examines how Chinese

* Adjunct Lecturer and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constructed an “imagined Chinese community” through the southern foreign states in response to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China colonized Nanyang”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se Nanyang topography writers, on the one hand, feminized, beastized, and sordidized Nanyang, trying to restore the long-broken views of all under heaven (views of *tianxia* 天下) through a strict Sino-barbarian dichotom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tressed that people in China and Nanyang shared the same origin in blood and language to blur the Sino-barbarian dichotomy and willfully expand the scope of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south. Both writing strategies were intended to include Nanyang as a part of China, thereby obtaining the psychological strength to resist Western and Eastern colonial imperialism.

Keywords: *Nanyang Yanjiu*, *Nanyang Qingbao*, Jinan University, mesology, Nanyang

南洋風起：

《南洋研究》與《南洋情報》的地誌書寫 （1928-1944）

黃國華

一、前言：中國殖民南洋論與地誌書寫

本文試圖從上海暨南大學《南洋研究》（1928-1944）和《南洋情報》（1932-1933）的南洋地誌書寫，觀察二戰結束前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透過「想像的異邦」建構「想像的中華共同體」，回應晚清民國以來「中國殖民南洋論」政治話語。

1920至1940年代，上海出現一股「南洋風潮」。據廖文輝所述，南洋被中國看見和重視，到近代才發生。鴉片戰爭以後，外患壓境和華人向外遷徙，激起中國學者研究域外史地的興趣，以北京大學為基地的北方學人側重西域研究，而以上海暨南大學為基地的南方學人關注更為南方的南洋，自1920年代起有規模地產出南洋論述。¹換句話說，

¹ 廖文輝：《馬新史學80年：從「南洋研究」到「華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頁14-17。暨南大學原在1906年創辦於南京，1923年遷至上海真如校區，並在1927年設置南洋研究機構「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1930年研究對象由南洋擴展到美洲，改名為「南洋美洲文化事業部」，這期間創辦《南洋研究》、《南洋情報》與《中南情報》等關注南洋問題的刊物，另編譯約四十餘種南洋專著，以及繪製十多種南洋

當中國面對西方列強侵略和被迫對外開放，開始想通過對「南洋」的認識，重新界定自身的疆域，參與世界新秩序，並從遍布華僑的南洋取得抵抗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1920年代上海暨大發行的《南洋研究》，乃將南洋風潮推向新高度。²除了暨大南洋刊物，上海其他書報也都順應這一潮流。如大型畫報《良友》（1926-1945）此時靠攏南洋讀者市場，穩定輸出南洋相關的圖像和文學作品，³上海各家書店亦出版多部南遊之書，包括梁紹文《南洋旅行漫記》（1924）、許傑《椰子與榴槿》（1931）、羅靖南《長夏的南洋》（1934）、艾蕪《南行記》（1935）、招觀海《天南遊記》（1936）等。

暨南大學以「南洋」之名的學術刊物，除了收錄有關南洋群島政治、經濟、教育和海外華僑的論文，也刊載不少記錄南洋奇風異俗、地理景觀、種族物產的遊記和風土志。尤其是作為《南洋研究》姐妹報的《南洋情報》（後改為《中南情報》，1935年起與《南洋研究》合併），內容偏向時事性，定時刊登南洋風土文藝。⁴值得留意的

圖表。參暨南大學校史編寫組編：《暨南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3-76。

² 王賡武認為《南洋研究》「促使中國政府更積極地捲入東南亞事物的這個強大的運動的最高潮。」王賡武：〈中國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收於王賡武著，姚楠編：《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6年），頁236。

³ 參黃國華：〈民國的南洋：上海《良友》畫報的「南洋群島」想像〉，《中國現代文學》第40期（2021年12月），頁151-177。

⁴ 《南洋研究》1928年1月由上海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創辦，歷經暨大南洋美洲文化事業部、海外文化事業部和南洋研究館等編輯發行，多次休刊，停刊於1944年9月。該刊初為月刊，後改為季刊，主要發表南洋地理歷史、物產分布、實業近況和華僑文化事業相關的學術文章，欄目有論叢、歷史、統計、地誌、傳記、調查、文藝、華僑消息等，偶爾在文章空白處放置篇幅甚短的南洋風土介紹。《南洋情報》由暨大南洋美洲文化事業部發行，創刊於1932年11月，屬於半月刊。與《南洋研究》偏向學術性不同，《南洋情報》偏向時事性，介紹南洋各種消息和討論南洋社會問題，主要設置南洋時事述評、專論、資料、南洋問題叢談、僑務與僑況、南洋要聞、文藝等欄目，內容涉及南洋時事評述、要聞摘要、華僑政經文教育介紹、風土奇談以及遊記。

是，與這些關注南洋風土刊物同一時空的，是廣州中山大學發行的刊物《民俗》（1928-1943），是繼北京大學《歌謠》後，最具影響力 and 刊行時間最長的中國民俗學刊物，引進西方人類學和民俗學理論，製作中國各地民俗風情專號。易言之，此一民國時段，正是風土學興盛之際，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和科學主義思潮息息相關，研究對象從中國之內，擴展到中國之外的南洋。

本文看重暨南大學南洋報刊在上海引領的南洋風潮，聚焦討論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所記述南洋風土的地誌書寫，⁵思考《南洋研究》的風土志和遊記，究竟以怎樣的書寫策略，回應當時「中國殖民南洋」的公共論述？觀察寫作者如何從中國看「周邊」，從「周邊」回看中國？

2008年耿素麗和章鑫堯彙編《南洋史料》，收入期數完整的《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但學界對於暨大南洋期刊的關注度似乎不高，多從歷史學或學術史角度切入，探討期刊內的論述性文章，較忽視風土記述和遊記。⁶鍾怡雯和張惠思同時談論民國初年南遊（來）

⁵ 地誌書寫乃參考米樂（J. Hillis Miller，1928-2021）的「地誌」（topographic）概念，從字源上來說，結合「地方」（topos）和「書寫」（graphein）二字的地誌，雖後來多指涉為地形、地景、地表的製圖，但最素樸、原始和直接的意思，是一個地方的書寫（the writing of place），以文字為景物（可以是自然地理、生活風俗和人為建築）創造對等的隱喻。參米樂（J. Hillis Miller）著，單德興編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臺北：書林出版社，1995年），頁82-83。地誌書寫不限於任何文類，具體介紹一個地方的客觀世界，或進一步對該地風土民情和人文歷史加以思考、投以情感的文字，都屬於地誌書寫。鍾怡雯述及，隨著20世紀初地理學學科觀念在中國興起，記錄海外出走經驗的遊記、隨筆和見聞錄，呈現出南遊文人深度的風土觀察，具有地域的辯證關係和立體的地方感，可納入馬華「地誌書寫」系譜。鍾怡雯：〈中國南遊（來）文人與馬華散文史〉，收於《后土繪測：當代散文論II》（臺北：聯經，2016年），頁237。本文要討論的地誌書寫，主要是風土志和遊記兩種文類。前者為記述當地風俗習慣、物產、氣候、建築和婚葬儀式等的隨筆，具人類學研究的史料價值；後者為作家遊歷異域的主觀記錄，同樣記錄當地風土，但展示更多個人遊歷的心靈活動。

⁶ 大陸姚瑞肯定《南洋研究》規範化南洋學術，關注其華僑教育論述，見姚

文人的南洋遊記，二人都以出版成書的作家遊記為研究對象，⁷未觸及同一時空點的南洋期刊，也未把刊物內的風土文本放置到「中國南洋殖民論」的現時語境加以詮釋，而這正是本文的著力點。

何謂「中國南洋殖民論」？19世紀至20世紀，南洋幾乎全面籠罩西方殖民勢力，中國從天下中心退為世界邊緣，促使中國知識分子須重構中國與南洋的關係，尋索一套提升國家地位的論述策略。1905年，梁啟超（1873-1929）發表〈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為八位從中國遷徙至南洋的移民立傳，強調中國人有擴張帝國主義的國民元氣，與西方列強有對等的國際競爭能力，視多數華僑盤踞的南洋，為中國天然的殖民地：「海以南百數十國，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黃帝子孫，以地勢論，以歷史論，實天然我族之殖民地。」⁸自此，中國知識分子紛紛肯定南洋華僑在外的拓殖行為，自行剔除殖民的暴力色

瑞：〈暨南大學《南洋研究》的辦刊歷程及研究貢獻〉，《廣東開放大學學報》第28卷第5期（2019年），頁34-37；姚瑞：〈《南洋研究》中的華僑教育思想〉，《海峽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頁31-35。新加坡Chen Ying以1911年至1937年間中國的南洋期刊為對象（含《南洋研究》），避談文藝內容，從這些期刊的論述性文章，觀察中國「南洋觀」的變遷，Chen Ying：《現代中國知識譜系中的南洋（1911-1937）》（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博士論文，2018年）。至於臺灣李盈慧則梳理《南洋研究》的文章內容和主題類別，未對刊物內風土敘事有進一步分析。李盈慧：〈中國視野中的南洋觀：1945年以前的暨南大學與南洋研究〉，收於李志賢編：《南洋研究：回顧、現狀與展望》（新加坡：南洋學會，2012年），頁69-90。

⁷ 鍾怡雯：〈中國南遊（來）文人與馬華散文史〉，收於《后土繪測：當代散文論II》，頁223-248；張惠思：〈跨文化行旅、異域新知與啟蒙意識——中國南來文人的馬來亞遊記與雜錄寫作（1915-1937）〉，收於何昆益編：《五四精神在東亞的發展與變遷暨跨文化研究》（花蓮：慈濟大學，2017年），頁313-345。另，夏菁主要以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南洋遊記為研究個案，認為這些文人的南洋書寫，多是表徵慾望的浪漫想像。夏菁：《慾望與思考之旅——中國現代作家的南洋與英美遊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而本文所論及的地誌書寫作者，多為學者身分，他們筆下的南洋，展露更多國難當前的憂患。

⁸ 梁啟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飲冰室專集》第4冊（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頁55。

彩，唯心地把南洋收編在中國之內，⁹建立民族偉力神話，重振弱國子民的信心。如李長傅將現時殖民概念聯繫昔時朝貢體制，認為中國對周邊的殖民不在於武力侵略，而是經濟貿易，另稱「移殖民」。¹⁰從這裡可知，「中國南洋殖民論」多以過去中國中心的天下觀，詮釋和轉化西方殖民話語，重拾已然消逝的帝國榮光。「中國殖民南洋」的提出，既是為了消除西方殖民東方、南方的壓迫感，亦是強調中國在新世界的關鍵位置，有介入南方的能力，消解其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危機意識。不過，這套殖民論並未流行太久，因它易使南洋華僑與當地土著產生隔閡，不利於海外華僑的本土生存，1930年代末後逐漸式微。¹¹

《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從內到外，都環繞「中國殖民南洋」話語。如鄭洪年（1876-1958）在《南洋研究》發刊詞中，聲明「發現南洋者為吾中國人」，中國比西方更早拓墾南洋，標榜中國人對南洋毫無侵略之意，與南洋的互動關係為文化教育的輸入，¹²建立中國與南洋共同反抗西方殖民霸權的協作關係。暨大更同步出版多部中國殖民南洋的專著，包括胡炳雄編《南洋華僑殖民偉人傳》、李長傅《南洋華僑移殖史》、《華僑殖民史》，以及劉士木等人譯著《中華民族之國外發展》等。¹³我們不禁好奇，暨大南洋刊物中記錄南洋

⁹ 強調唯心，是表示此時中國始終在南洋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只能透過人力和文化輸出，作出想像性的殖民。事實上，作為體現出天下思想的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本從文化角度將「四夷」包括在內，不對四方異民族社會進行直接統治，而是假定「四夷」遲早或應該進入正統王朝領導的天下體系。參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年），頁1-26。

¹⁰ 李長傅：《中國殖民史》，收於周谷城編：《民國叢書第二編》第26卷（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頁1-20。

¹¹ 顏敏：〈民國南洋學的幾種話語（1912-1949）〉，《東南亞研究》2011年第1期，頁90-94。

¹² 鄭洪年：〈發刊詞〉，《南洋研究》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頁1-5。

¹³ 有關暨南大學如何透過叢書、報刊和翻譯，建構中國本土化的殖民話語，參陳嶺：〈「反殖」與「殖民」：中國本土化南洋觀和「殖民」話語建構——暨南大學的南洋書寫（1927-1937）〉，《東南亞研究》2021年第1

風土的地誌書寫，是否隱隱然地推助「中國南洋殖民論」的傳播？因掌握異國風土的人類學知識，本就是殖民主義得以擴張的重要環節。

以下從「華夷之辨」和「華夷之變」兩個面向，¹⁴考察《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的地誌書寫者讓我們看見怎樣的南洋？如何處理中原與南蠻、自我與他者、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和位置？這與「中國南洋殖民論」又有何關聯？

二、華夷之辨：崩裂「天下觀」的再修復

《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的徵稿是對校內外開放，稿源有來自暨大南洋文化事業部的劉士木（1889-1952）、俞君適（?-?）、李長傳（1899-1966）、陳希文（1903-1994）、姚楠（1912-1996）、顧因明（1881-?）、溫雄飛（1888-1974）等人，少數已知作者身分的稿件為暨大南洋僑生，如林金沙（?-?）、海愁（?-?）和葉惟德（?-?），還有一些稿件作者是身分不明的校外人士。有的稿件甚至直接截取南洋當地華人報刊，作者有可能是土生華人。¹⁵不管怎樣，這兩

期，頁130-151。

¹⁴ 據王德威「華夷之辨」和「華夷之變」之說：「前者隱含區分種族、文化、政治立場的『畛域化』（territorialization）設定，後者藉『風』與『勢』的能動性，更新、甚至翻轉華夷關係的可能。」二者在中國近三百年一直激烈轉換，相互辯證。王德威：〈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中國現代文學》第34期（2018年12月），頁1-28。中國殖民南洋論，很大程度是以傳統天下觀重詮現代殖民觀念。天下觀的運轉，會通過「華夷之辨」（中華文明是區分華夷的尺度，確立中原文明優越的位置）和「華夷之變」（中華文明可後天學習，透過化夷為華，撐開帝國的想像疆域）。有關「天下」和「華夷」互相鑲嵌的討論，另見許紀霖：〈天下主義／夷夏之辨及其近代的變異〉，《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頁66-75。而1920至1940年代中國文人的南洋地誌書寫，因直接描繪和評述南洋的文化面貌，可呈現華夷之間時近時遠的距離，或融或斥的狀態，故本文以「華夷之辨」與「華夷之變」作為南洋地誌書寫的分析視角，觀察這筆資料如何回應暗藏天下觀的中國殖民南洋論，將已成為西方殖民地的南洋異域納入共同體想像。

¹⁵ 如〈南洋土著避刃術〉（《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9年〕，頁11）和

份暨大南洋刊物的風土志和遊記作者，主要是短時間逗留在南洋的中國人，他們筆下的南洋多是陰性的、野蠻的、狂歡的、濃郁的、需要被撥亂反正，顯露從制高點和中心點望向邊陲的華夏視野。

（一）南洋的女性化：南國多麗人，被開墾的處女地

《南洋研究》所「再現」（represent）的南洋景觀，當地女性總是讀者第一眼看見的前景。單從第1卷《南洋研究》前頁所列示的南洋圖像，每期至少會有一張女士人的全身或近身照，如第1期「南洋荷屬峇厘陵（Bali）婦女」、第2期「南洋英屬馬來半島之美女」、第3期「婆羅洲沙撈越之土人婦女」、第4期「暹羅女伶表演之一斑」、第5期「緬甸之時裝女子」，以及第6期「馬來半島之沙蓋族女子」。這些照片多採記錄全身的人類學鏡頭，使得當地女子由頭至腳被讀者一覽無遺，要麼突顯她們袒露的乳房，要麼捕捉她們的婀娜風情。這種對女性毫無保留的男性凝視（male gaze），也充分體現在《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的地誌書寫。

《南洋情報》連載胡覺根（?-?）一系列步行東婆羅洲河流的遊記，每次剛進入一個地方，率先映入眼簾的總是具有挑逗力的當地女子。如當作者剛來到三馬林達（Samarinda）不久，即細緻描繪當地女子的膚色和服飾，突顯她們性感的外在，向讀者呈現「南國多麗人」的樂園景致：「面敷白粉如發酵『朱古力』糖之美婦女，隨時可遇見之。華人娶『巫來由』女而生之峇峇腳踏尖端瘦腰之高跟拖鞋，圍絲質雜之『紗籠』，腰纏粉紅色或深綠色絲帶，身穿蟬翼薄紗對胸衫，嬌豔之底衣，頭梳光澤可鑑之巫來由髻，……古稱南國多麗人，

〈爪哇土人割禮遊行記〉（《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9年〕，頁67）二文，早在1926年分別刊登於由印尼華僑在蘇門答臘發行的《南洋時事彙刊》，見〈南洋土會避刀術〉，《南洋時事彙刊》第1卷第10、11合刊（1926年），頁115-116；〈爪哇土人割禮遊行記〉，《南洋時事彙刊》第1卷第10、11合刊（1926年），頁116。上述文章發刊時，未標示作者。

此之謂歟？」¹⁶又當作者剛走進爪哇村，第一眼看見的除了屋宇，便是馬辰土人婦女：「村中婦女，多以金飾物佩胸前，手鉅指環，亦多有之，掛錢囊於腰帶間，……。」¹⁷縱然，胡覺根也會看見男土人，但描述的篇幅和程度，遠不如女士人。以〈步行丁加郎一帶〉為例，作者描繪自治邦王城丁加郎的男女，惟焦點主要放在當地女子，用更多文字記述女子誘人的體態、姿勢和聲音，而僅有一句描述當地男子精神層面的整體印象：「王宮中之女子或婦人，體態多弱小如不勝衣，行時作折腰步，有風前柳條之姿。聲嚶嚶如出谷新鶯，清脆婉轉，至悅人耳。男子多呈憔悴狀，一種頹暮之氣，至令有志者見而悽然太息也。」¹⁸換言之，這些遊記所構成的南洋圖像，女士人形象比男土人更為清晰，且彰顯她們的悠閒氣韻，¹⁹把南洋打造成會主動撩撥和撫慰中國行旅者心靈的「溫柔鄉」。

上述南洋女性的外在描摹，尚算克制，記錄女子身外的裝飾物，突出她們柔弱飄逸的氣質，貼合中國傳統審美觀。然而，刊物內還有不少南洋女子的記述，遊走在尺度邊緣，目光直接鎖定女子的性徵和身體曲線。如在蘇門答臘居住六年的中國記者孔繁禮（?-?），毫不避諱地凝視當地女人赤身洗滌衣服的場面，強調她們暴露在外的身體，屬於自然的健康美：「小溪石上蹲著三三五五的馬來女人，裸露

¹⁶ 胡覺根：〈步行高低河流域各埠記〉，《南洋情報》第1卷第4期（1933年），頁148-150。

¹⁷ 胡覺根：〈步行高低河流域各埠記（續）〉，《南洋情報》第1卷第5期（1933年），頁197。

¹⁸ 胡覺根：〈步行丁加郎一帶〉，《南洋情報》第1卷第7期（1933年），頁277。

¹⁹ 茲舉兩例：沈美鎮講述婆羅洲風俗時，特開一小節談論馬來舞女的歌聲和舞姿，由此把南洋渲染為「如是的生活，是多麼舒閒恬靜的啊。」沈美鎮：〈婆羅洲土人的風俗〉，《南洋研究》第3卷第4期（1931年），頁76。俞君適〈南遊鱗爪〉一文，安插三張當地土著婦女的照片，其中兩幅是裸上身，並引述羅靖南《長夏的南洋》（1934）有關女士人悠閒的生活記載：「一個穿內衫，裸露上半截的乳房的青年女人，安閒的坐在地板上，一個男子悠然的睡著，把頭枕在她的肥腿上。」俞君適：〈南遊鱗爪〉，《南洋研究》第7卷第2期（1937年），頁154。

上身，下體圍著一條印了大紅色花紋的紗籠，在洗滌她們的衣物；健康美在她們半裸的身體上很自然的表現出來。」²⁰胡覺根觀看帝益族的歌舞表演時，直接凝視女土人的乳房，觀察其性發育的狀態：「番人雖不知年，然舞女之乳房膨脹狀，實是以表示其入世之歲月。」²¹縱然部分南洋土著衣不蔽體的習慣，促使這些中國觀者無從迴避對當地女體的注視，然而有的觀者認為南洋女子是主動向他們提出凝視的邀請，她們的身體是可供他們恣意消費和鑑賞，毫無道德負擔。如〈爪哇舞〉一文提到，「觀者可以擲資一角，入與舞女對舞。捫胸撫乳，摟腰親吻，終一曲而退。此時也，舞女羞容滿面，四方笑聲震天。」²²一位筆名為低能兒的作者，寫道：「給檳榔染得血紅的櫻唇，顯出一種烏牡丹的嫵媚。黑美人似的窈窕。……這意思當然是給我們細細賞鑑。」²³

中國男性作家和讀者，似乎在這段凝視南方「她者」的過程中，獲得一種假想的支配權，女土人被刻意「放大」的性誘惑力，化作吸引更多中國人（尤其男性）前來南洋墾殖的殖民驅力。這種將異域性別化為女性，製造出南國盡是麗人，南洋為女人之地的錯覺，近似西方觀看東方、殖民者凝視殖民地的帝國視野，殖民地中具有誘惑力的女性身體以及物產豐饒的土地，是征服的慾望對象。²⁴事實上，中

²⁰ 孔繁禮：〈南遊回憶錄〉，《南洋情報》第2卷第1期（1933年），頁38-40。孔繁禮在為南洋果子榴槿撰寫詠物的竹枝詞時，也會特別放入當地婦女的角色，勾勒南洋女性的身體線條：「巫婦颯然呈曲線，『沙籠』典卻換『流連』。」孔繁禮：〈南遊回憶錄〉，《南洋情報》第2卷第5期（1933年），頁276-277。

²¹ 胡覺根：〈帝益族之歌舞〉，《南洋情報》第2卷第5期（1933年），頁275。

²² 無名氏：〈爪哇舞〉，《南洋研究》第1卷第5期（1928年），頁62。

²³ 低能兒：〈微露一抹紅牆〉，《南洋研究》第2卷第1期（1928年），頁132。

²⁴ 此一性別化殖民地的討論已相當普遍，可參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縣：立緒文化，1999年）和瑪麗·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著，方傑、方宸譯：《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值得一提，中國知識分子是否有透過當時西歐和日本遊歷殖民地的遊記翻譯，挪借與效仿其「女性化」殖民地的視線，有待日後作更深入和全面的資料蒐

國史書和古典小說早已出現這類性別化中心以外的空間敘事，反映中國原有的「華／夷」和「中原／邊緣」想像，即經常描述遠離中原的海外或西方大荒，會出現女人國或女兒國，包括《山海經·海外西經》、《後漢書·東夷列傳》、《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列傳》、《大唐西域記》、《諸蕃志》、《西遊記》、《三寶太監西洋記》和《鏡花緣》等。鄧津華更提出自古以來，中國「南蠻」記述的重要主題，即強調婦女的主導性和性別倒錯，南方是「女性的」，目的是鞏固中原為尊的位置：「無論在文學或歷史文獻中，將南方女性化的做法，恰與將北方邊境男性化形成對比。……透過南方民族女性化、將北方民族男性化，便得以讓『中原』理想的漢人自己居於中央，成為得天獨厚的範準。」²⁵這套性別隱喻，與西方殖民論述帶有拯救、占有和侵入之意略有不同，²⁶它主要是確認中原（支配）與中原之外（從屬）的政治位置，以禮教文明為基準，吻合當時極力抹除暴力元素、遙想朝貢歷史記憶的「中國殖民南洋論」。不過，暨大南洋刊物女性

集。《南洋研究》翻譯不少歐美和日本遊記，其中李耀商翻譯日本松內冷洋〈遊歷南洋以後〉，開頭描述一般日人對南洋的樂土想像，以為那裡總有美人身穿鮮豔沙籠，在椰樹下歌舞，惟並非所有翻譯遊記都聚焦描述當地土人的身體。松內冷洋著，李耀商譯：〈遊歷南洋以後〉，《南洋研究》第3卷第6期（1931年），頁80-91。

²⁵ 鄧津華著，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年），頁212。另參Dru C. Gladney,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no. 1 (February 1994): 92-123. Gladney述及遵從父權價值觀的漢族，總將少數民族女性化或物化為他者（Other），把少數民族女性看成是慾望旺盛的，是原始的，彰顯漢族的進步和文明，藉此完成多數民族對少數民族的控制。

²⁶ 自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薩伊德《東方主義》（*Orientalism*）提出西方人對於東方（阿拉伯—伊斯蘭）有特定刻板印象後（如用性意味的方式看待東方），女性主義學者開始積極討論殖民論述中的性別政治問題。包括史碧瓦克（Gayatri C. Spivak）檢視英國殖民者對印度殖民地女人論述，揭示其中有「白色男人從棕色男人中拯救棕色女人」的命題，其性別化的拯救論述，呈現出帝國主義野心。相關論述脈絡，可參林津如：《女性主義與流變——後殖民女性主義》（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9年），頁478-524。

化南洋的地誌書寫，仍不自覺地沾染些許殖民暴力的成分，表現在「處女地／處女林」外來語詞的使用上。

《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遊記除了積極地把南洋女人推向讀者眼前，打造任由欣賞的赤道（裸）風景線，亦會將南洋土地直接類比為女性身體。如張一帆（?-?）把泰國名為「蚊亂」之地，比擬為女子胴體：「倘是我們要拿蚊亂比方做一位女子，那末，山丘正是勾人魂靈的玉峰呢。」²⁷更有意思的是，胡覺根曾把東婆羅洲丁加郎一帶的荒山荒島，看作「一如美人處女，無處不令人愛慕也」，²⁸之後在描述海外華僑發現礦物、開闢南洋的艱辛歷程時，把待開發的南洋視為處女：「探處女林，冒瘴癘以開闢生瓦生瓦。……余恐其地下寶藏，至今仍屬如故，或竟瘴癘與禽獸蟲蛇填塞之處女林，……。」²⁹

據伍鐵平（1928-2013）所述，漢語本無用「處女（的）」來延伸「第一次」和「原始」意思，因中國長期對性有所避諱，且沒有古代西方強烈的貞潔崇拜。「處女（的）」可能先由英、法、荷或俄等外語進入日本後，轉化為日語（仿造漢語），再傳入中國。³⁰伍鐵平沒有細述「處女地／處女林」詞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本文發現1919年至1935年間，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多次刊登以“virgin soil”和“virgin land”作標題的新聞。有時“colonization”一詞直接成為主標，放置在“virgin land”副標之前，坐實「殖民地」與「處女地」的關聯性，發展殖民事業即是開闢處女地。³¹「處女地」在中國成為普遍用語，可能跟1930年代小說翻譯有

²⁷ 張一帆：〈蚊亂印象記〉，《南洋情報》創刊號（1932年），頁27。

²⁸ 胡覺根：〈步行丁加郎一帶〉，頁276-278。

²⁹ 胡覺根：〈步行生瓦生瓦〉，《南洋情報》第1卷第8期（1933年），頁325-328。

³⁰ 伍鐵平：〈「處女（的）」的轉義及其同文化的關係〉，《四川外語學院學報》第72期（1999年），頁102-105。

³¹ 見A correspondent, “Colonization of N. Manchuria: Major Palmer’s Ranch of Virgin Lan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0 May 1925, 7. 另參付成雙：〈處女地假說與北美印地安人的命運〉，《史學集刊》第2期（2021年3

關。1933年7月，具日本留學經驗的樓適夷（1905-2001）在《正路》翻譯俄國小說家梭羅訶夫（Mikhail Sholokhov，1905-1984）的*Virgin Soil Upturned*，題目譯為《被開墾的處女地》。此後，林疑今（1913-1992）、季明（?-?）、周立波（1908-1979）和李虹（?-?）等人多次翻譯此作，皆保留「處女地」一詞，這一詞開始頻密出現在書評和廣告，使得中國知識分子漸漸以這具有情色性和攻擊性的外來詞彙，描述國內外土地開發的行為，稍稍違反「中國殖民論」的和平論調。如1933年《東方雜誌》刊登標題為「鴨綠江上流之處女林」的照片，³²《良友》記者莊學本（1909-1984）曾描述川省西北為「可耕可牧之處女地，萬里平原、昔番民未能開發。」³³

上述《良友》西北「處女地」報導，與《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性別化的地理敘述，如出一轍。它們都先將中原的邊陲之地，描述為等待開發的「處女地／處女林」，進一步說明此地有違中原「男主外／女主內」的想像，女性從事耕作，男性遊手好閒，西北和南洋的開發事業有所耽誤。³⁴藉由突顯「處女地」在地男性的失能，暗示有資格替補這些男人位置，有能力為西北和南洋「破處」（女人與土地）的人，³⁵是從中原移動各地的海外華僑。如《良友》編輯曾呼喚

月），頁56-71。

³² 〈東北特產〉，《東方雜誌》第30卷第11期（1933年），頁1。

³³ 莊學本：〈今日之吐蕃民族：一個男惰女勤的社會〉，《良友》第112期（1935年），頁18。

³⁴ 如胡覺根寫到南洋馬辰土人性別錯置的勞動狀況：「摘取禾穗者，多屬婦女輩」、王且華譯〈婆羅洲中部航海記〉，述及婆羅洲達亞克婦女負責家中生計，男性卻安處家中、顧因明遊記譯文亦提及湄國（今緬甸東北部）「男子操作之勤，遜於婦女」。分見胡覺根：〈步行高低河流域各埠記（續）〉，頁196；Irving M. Smith著，王且華譯：〈婆羅洲中部航海記〉，《南洋研究》第2卷第2期（1928年），頁83-93；未標示作者，顧因明譯：〈湄國徒步旅行記〉，《南洋研究》第3卷第6期（1931年），頁94。

³⁵ 《南洋研究》有一文表示檳榔嶼土生婦女嫵媚標致，當地華僑聚集該地求娶「南國佳人」，且認為當地女性的數量是男性一倍以上，明示南洋多女性可供中國移民婚娶。學潛：〈檳榔嶼之華僑婦女〉，《南洋研究》第3卷第1期（1930年），頁125。

長期在外開發南洋群島的華人移民能重返中國，以其「偉大的開拓力量」開發西部邊陲處女地——西康省。³⁶這套「性力／開拓力」結合的說辭，合理化和正面化中國的「移殖」論述，寄望海外華僑向周邊擴張拓殖勢力，面對南洋處女地，不是要像西方殖民帝國般爭取實際統治權，而是介入當地經濟發展。

（二）南洋的野獸化：獠獠狃狃，蠻夷歸順

《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除了把南洋視為待開發的「她者」，以鞏固中原掌控邊緣的權力想像，同時也將南洋看作待馴服的「牠者」，重構四夷服屬中國的天下秩序。

暨大南洋刊物有兩種「動物化」南洋的呈現方式。其一，大肆描寫南洋被多種巨大的、奇異的、兇殘的野獸盤踞，保留生物多樣性，被拋在現代性進程的後頭。如筆名為「劍」（?-?）的人，在《南洋研究》發表了二十餘篇風土隨筆，其中六篇都在描述南洋多蛇或有巨蛇，如〈蛇腹逃生〉（第2卷第2期）、〈蛇山〉（第2卷第2期）、〈籐蛇〉（第2卷第3期）、〈大蛇〉（第2卷第3期）、〈蛇食牛〉（第2卷第3期）、和〈琴蛇〉（第2卷第4期）。《南洋研究》還不時刊登南方之蛇圖像。³⁷這不僅是客觀事實的陳述，實際反映中國傳統地理想象，迎合讀者預期看見的南方奇觀。像吳春明和王櫻所述，《說文解字》中「蠻」字與蛇有關，華夏民族視華南民族（含臺灣和東南亞南島語系民族）為「南蠻」，當作非我族類的「蛇種」，把蛇看作南方族群的識別符號。³⁸此外，胡覺根婆羅洲遊記一方面描述危機四伏的南洋生態，寫道：「猴啼鳥叫，其聲萬狀，幾使余疑此身復

³⁶ 〈編輯者言〉，《良友》第158期（1940年9月），無頁碼。

³⁷ 未標示作者：〈馬來半島巨蛇嚙物後之狀態〉，《南洋研究》第1卷第3期（1928年），頁1；〈印度人之弄蛇者〉，《南洋研究》第1卷第5期（1928年），頁1。

³⁸ 吳春明、王櫻：〈「南蠻蛇種」文化史〉，《南方文物》第2期（2010年6月），頁89-102。

在戰場中，衝鋒陷陣時。……所行各處，時見巨蟹長爪之怪蟹，及運地下土積穴外如小坵之大蝦」；³⁹一方面描寫南洋巨獸與人和平共處的日常生活，「夜後，狡猾之大鱷魚。時橫身臥入門外，狀如馴服之家犬。」⁴⁰如此生命力旺盛的野獸之地，既危險又安逸，能激起中國讀者前來探險的征服慾望，暫時遠離此時死亡慘重、節節敗退、無能為力的中國國難。

其二，地誌書寫者眼中的南洋土著，不管外型、身姿和習性，都有向動物流變的傾向：裸身、生食、行動矯健、可通動物語等。如志宏（?-?）敘述馬來群島Sakai人，「性凶獷，矯健如猿，飲血茹毛，不著衣服；偶遇生人，則攫而食之。」⁴¹沈美鎮（1908-1984）認為婆羅洲當地土人能聽鳥聲，日與深山野獸為伍。⁴²劍提出「炎國荒島無奇不有」，南洋土人有生吃鱷魚的習慣。⁴³胡覺根遊記中「動物化」土人的描寫最為細緻，觀察到帝益族身體與野獸合而為一，具有超越凡人的身體素質，「其人民似甚少疾病，走林叢崎嶇，捷如猿鳥」，⁴⁴亦有模擬動物的捕獵技能，「能作各種禽獸鳴，常以大鳥之屍體作冠，匍如狗。或披獸皮如獸狀，……禽獸見之，常誤認為真同類。」⁴⁵這些風土敘述鋪墊一連串「熟食／生食」、「蔽體／裸體」、「遠動物／親動物」人禽之辨的對比組，將中國人（觀者）和南洋人（被觀者）劃分出壁壘分明的「文明／野蠻」二方，提升中國的文化優越感，而這一修辭早見於中國古典文獻。

³⁹ 胡覺根：〈由生瓦至馬冷加由〉，《南洋情報》第1卷第10期（1933年），頁400-402。

⁴⁰ 胡覺根：〈步行高低河流域各埠記（續）〉，頁195。

⁴¹ 志宏：〈馬來群島之Sakai人〉，《南洋研究》第1卷第3期（1928年），頁16。

⁴² 沈美鎮：〈婆羅洲土人的風俗〉，頁73-76。

⁴³ 劍：〈食鱷〉，《南洋研究》第2卷第3期（1928年），頁119。

⁴⁴ 胡覺根：〈帝益族之歌舞〉，頁274。

⁴⁵ 胡覺根：〈帝益族之奇俗〉，《南洋情報》第2卷第6期（1933年），頁315。

過去中國的「華／夷」之辨，會通過「動物化」中原以外的四方蠻夷，要求他們「向內歸順」，惟不主張向外占有蠻夷的土地和資源，而是徵用蠻夷的野性能力，回饋到中央的防禦體制。如《周禮·秋官司寇》提到征四夷而所獲的蠻夷之隸，各自發揮馴獸和善獸言的本事，守護中央政權：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⁴⁶

時至近代，反西方殖民而又想自建殖民論的中國，延續「動物化」蠻夷的傳統思維，標榜相對文明的中國人會援助未開化的野蠻民族，實踐互惠互利的經濟貿易，而非單向的侵略。像〈越南之獠民〉一文，作者先形容越南獠民「獠獠狃狃，絕無文化」（按：獠狃指野獸出沒的景象），再一面敘述遠離禮教文明的南方土人，是非人的，須教化的；一面強調他們與中國人友好，願意與之生意來往，因中國人總同情和贊助他們，故會用安南土語「亞叔」稱中國人以示親暱。中國以「德」和「智」，深得獠民苗、獠、獠三族民心，獠民甚至願意為中國人而死，抵抗掠取他們財產的法國殖民者。⁴⁷

縱然這些書寫南洋地誌的中國人，或顯或隱地說明自己與南蠻為善，互相成就，但不時暗中展示文明古國的威勢。曹仲淵（1892-1972）〈蘇門答臘火山遊記〉一文，顯露尊卑有別的華夷權力關係。

⁴⁶ 林尹註譯：《周禮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388-389。原書句讀均作句號，改為新式標點符號。

⁴⁷ 未標示作者：〈越南之獠民〉，《南洋情報》第1卷第6期（1933年），頁225-228。王維駟亦曾講述海洋生態多元的南洋群島盛產海參，而中國是世界最大海參輸入國，突顯南洋與中國緊密的商業關係。王維駟：〈檳榔嶼之海參〉，《南洋情報》第1卷第8期（1933年），頁315-316。

文章把引領一群中國登山者（曹仲淵、劉士木、洪敬銘、黃基馨等）進入蘇門答臘火山的土人嚮導，描述為佩戴大刀、時而猙笑、令人不安的異物，如獸如魅，「攀援猱登，學猿猴行」。一開始，熟悉山林的土人持有行動掌控權，「祇得追隨其後，任其飛跑而已。設令引入蠻邦虎穴，山窮水盡，亦難自主。蓋此時行動之權，完全操諸該土人之手也。」⁴⁸爾後土人因安全考量，兩次勸阻他們繼續登峯，卻遭到否決，話語權始終落在自詡「吾輩文人」的中國人手上。作者進一步描述土人拜服於「吾輩文人」入山之勇氣和毅力，「獸」態畢露：「嚮導者則張口如牛鳴，瞪目如痴漢，察其意態，似以吾輩文人，乃有如此本領，如此膽量，至為可佩也。」⁴⁹對於中國人而言，華夷之間有著難以撼動的「支配／從屬」權力結構，幻想不復存在的「四夷賓服」場景。

（三）南洋的黏膩化：文明與瘋癲，污垢與榴槿

暨大南洋刊物的地誌書寫者，常為「南洋」刻畫出令人不悅的身體展演、氣味環境和聲音景觀，突顯南洋和土人污穢的、失控的、惡臭的、喧鬧的、油膩的一面，由此抬高「中國」的文明地位，自我賦予撥亂反正的教化使命，嚴守「華／夷」主從有別的界限。我們不難看到這群地誌書寫者向讀者呈現的熱帶世界，往往帶有黏糊糊的質感，從土人身體到當地物產，鏈接到讓人厭棄的排泄物。

首先，是土人黏膩的身體。《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的遊記，經常記錄土人汗流浹背的亢奮狀態。如覺中（魏覺中，?-?）特寫跳舞會中南洋土人黏濕酸臭的身體，認為他們以積累污垢為榮，盡情享樂：「他們抖擻精神，絕不以飛塵未可畏，汗流被體，飛塵遇之而凝他們黝灰色的身體，……他們都各拼盡平生力量去歌唱跳舞，使

⁴⁸ 曹仲淵：〈蘇門答臘火山遊記〉，《南洋研究》第1卷第2期（1928年），頁108。

⁴⁹ 曹仲淵：〈蘇門答臘火山遊記〉，頁109。

流汗與塵垢，在他們身體，好凝結得多日厚，……。」⁵⁰劍〈懶漢之道理〉也寫道：「古書曰：沃地之民多懶，熱帶之植物生長甚易，而土質肥沃，復因氣候炎熱，以故土人懶，每行熱帶國中，即撞見一種土人面目污垢披一極不潔之『沙郎』，日則徘徊街邊，午睡於靜地，……。」⁵¹南洋土人易於流汗積垢，多被中國知識分子詮釋為熱帶氣候決定其「好逸惡勞」的民族特性。他們引用《國語》「沃土之民不材」之說，傳遞看似符合科學理性，實則過時的環境決定論風土學，⁵²藉由定格熱帶民族的怠惰姿態，釋出南洋土人需要被改風易俗的訊息。

另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滄海餘生〈東南洋漫遊隨筆〉。作者曾遊歷日本和南洋，於是刊載一邊寫日本，一邊寫南洋的遊記，作出鮮明的「文明／野蠻」、「有序／失序」、「可敬／可怕」的對照。滄海餘生曾描寫馬來半島吉打州高仔武勝（Kuala Muda）和亞勞司打（Alor Star）鬥雞鬥牛活動，現場進入狂歡脫序的時刻，人與動物皆汗水淋漓：「游人如蟻，烈日如焚，……揮汗如雨，目不轉睛，……牛頸血跡殷然，背汗淋漓。」⁵³下一章節寫日本日光市之旅，作者參觀德川家廟，看見日本男女安靜沉穩，「跪聽甚謹」，與前文髒亂的南洋男女，有文化素養高低之分。作者數次提及日人深受大唐文化影響，具體體現在具唐代規模的建築上，故文中日本的文明表現，不完全是因為接受西方現代化洗禮，更因歷史上日本長期漢化所致。透過

⁵⁰ 覺中：〈南遊拾零〉，《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9年），頁103。

⁵¹ 劍：〈懶漢之道理〉，《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9年），頁90。

⁵² 和辻哲郎（1889-1960）曾對西方風土學作歷史性考察，指出西元前古人認為氣候風土規定國民特性和命運，直到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出現，質疑環境決定國民性情的普遍性原則（炎熱使人懶散，寒冷使人緊繃）。然而到了20世紀初，西元前風土學席捲而來，可能跟殖民政策有關。和辻哲郎著，朱坤容譯：《風土：人間學的考察》（北京：東方出版社，2017年），頁205-241。

⁵³ 滄海餘生：〈東南洋漫遊隨筆（續）〉，《南洋研究》第2卷第2期（1928年），頁97。

顯現這條中華文明的傳播鏈，該文無形中提示讀者來自中原的漢人移民，有能力協助南洋改造有待洗滌的「身體／國體」。

其次，是黏膩的南洋食物。低能兒〈嘗榴蓮〉一文中，表示完全無法忍受南洋特產榴槿的氣味和味道：「這臭味也不像毛（按：茅）廁中的氣息，也不像上海喜吃的臭豆腐干那種味道，總而言之，是一種說不出的臭而已。……滑膩膩的富有粘性的東西瀰漫了手指之間，正像發了酵的乳酪一般。一層乳色的表皮破裂了，露出膠汁般的東西，那簡直不像是什麼果實，正似白色的稀爛的糞！」⁵⁴ 同時間短暫寓居南洋的許傑（1901-1993），也曾公開排斥這一象徵南洋的果實，甚至認為老南洋人吃奇臭的榴槿，乃出賣個人節操，好比他們能忍受帝國主義者的羊腥臭。⁵⁵ 我們可看到此時中國南遊（來）文人，雖記述風土，但不融入其中。直到馬來亞本土意識漸強的1950年代，我們才看到當地潮州峇峇〈榴槿季節話榴槿〉一文，不解南來華人何以抗拒榴槿，認為一旦吃了榴槿即可終止唐山的眷戀，對馬來亞產生擺脫不了的情感，味蕾隨著國族認同的轉移而有所變化。⁵⁶ 除了榴槿，魏覺中也羅列荷屬巴布亞的各種異味（野味），包括當地人吃蚊子、碩莪樹菌、碩莪樹蟻，以及地內青白色的泥土。⁵⁷ 這些異域食物的敘述，旨在建立難以理解、滿足讀者獵奇心理、可被批判的南洋物系統，對南洋之物作固化的認知：臭的、滑膩的、異常的，表明華夷之間在生活慣習和感官知覺上，有難以跨越的鴻溝。

不過，並非所有地誌書寫者，堅守「尊華抑夷」立場。民國初年輾轉在印尼、馬來亞多地任教和辦報，有更深入南洋生活經驗的劉士木，在《南洋情報》「南洋奇談」和「南洋叢談」專欄中，以相對客

⁵⁴ 低能兒：〈嘗榴蓮〉，《南洋研究》第2卷第1期（1928年），頁132。

⁵⁵ 許傑：〈榴槿〉，《椰子與榴槿》（上海：現代書局，1931年），頁55-56。

⁵⁶ 潮州峇峇：〈榴槿季節話榴槿〉，《蕉風》第17期（1956年7月），頁1。

⁵⁷ 魏覺中：〈巴布亞島加雅人的生活概況〉，《南洋研究》第3卷第4期（1931年），頁77-82。

觀的態度評述南洋風土。例如特別提到口味沒有優劣之分，且是浮動不定的，南洋人愛吃中國人意想不到的食物，正如廣西人好吃上海人不敢下筷的野味，當地華僑也會適應南洋各種奇特菜餚。⁵⁸再者，劉士木認為南洋其實比中國更普遍地接受西方現代性，衛生設備可能比中國還好，南洋不見得是藏污納垢之地，毫無動靜地待在現代時間的最後方。⁵⁹

不管怎樣，《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更為強勢的聲音，仍是堅守夷夏之防，認為夷是文明程度更低的（陰性、野蠻、污穢），反對當地華人「巫化」，⁶⁰時刻警惕當地華人與土人拉開距離，移（巫）風易俗，壯大中華共同體。像江應梁（1909-1988）屢次作出「反同化」發言，認為華僑「夷化」是西方殖民的陰謀，讓中國人退化為南洋土人，隔絕華僑與中國關係，乃因西方列強害怕人種更為優越的華人獨立自強，擔憂南洋變成中國的殖民地。⁶¹惟有建構出由上往下俯視或者由中心望向邊緣的華夏視角，中國學人才能穩住「中國殖民南洋論」立足點，重新修復那已然「天崩地裂」的天下觀，⁶²冀望能有重演昔日教化四夷的可能性。

⁵⁸ 劉士木：〈瓜哇土人奇特的餚饌〉，《南洋情報》第1卷第3期（1932年），頁95-96。

⁵⁹ 劉士木：〈南洋叢談〉，《南洋情報》第1卷第9期（1933年），頁364。

⁶⁰ 「巫」指馬來半島巫來由人，這裡表示被當地民族同化。如孔繁禮所述：「因為往返困難，鄉音迥隔，便和祖國的關係漸次消失，國家觀念也跟著湮沒了。和土人雜住久了，語言習俗，駁假而成巫化了，……。」孔繁禮：〈南遊回憶錄〉，《南洋情報》第2卷第2期（1933年），頁86。

⁶¹ 參江應梁：〈華僑與土人同化問題〉，《南洋情報》第1卷第2期（1932年），頁43-44；江應梁：〈救僑應從灌輸文化入手〉，《南洋情報》第1卷第5期（1933年），頁181-183。

⁶² 這裡「天崩地裂」一詞，乃參照葛兆光說法，葛兆光：〈天崩地裂——中國古代宇宙秩序的建立與坍塌〉，《葛兆光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07-116。有關晚清以來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的天下觀解體，迎來去中心化的萬國觀和世界觀，參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晚清民族主義形成的中間環節〉，《二十一世紀》第94期（2006年4月），頁40-53。我們可同步參考鄭文惠有關近代中國再現南洋的圖像論述，19世紀末當西

三、華夷之變：同源同種的新發現（明）

上一章節，我們看到南洋地誌書寫者積極地防範「以夷變夏」，透過辨明華夷界限，確立彼此支配（華）與從屬（夷）關係。然而，這不是唯一的風土表述方式，不少地誌作品嘗試作出混雜的「華夷之變」，惟是有條件的變，可接受單向的由夏變夷，目的同樣是建構以漢為中心的中華共同體。

（一）血緣的神話，華語的流播，移殖的遺址

《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的風土志和遊記裡，不時看見作者強調南島民族與漢民族之間，存有血緣關係，有的是直觀判斷，有的引述當代研究成果，言之鑿鑿。茲舉三個例子：第一例，老雄〈馬來民族是華人後裔的傳說〉一文中，向讀者分享馬來歷史學家最新研究，認為東印度群島占多數的馬來民族（巫來由族），可能是2500年前中國人南渡當地與番女結婚生出的混血兒。⁶³這段未有定論的族群來源敘述，提示讀者馬來民族是血統不純的新族群，而更為古老的中華民族，站在源頭位置，開啟血脈的「縱的繼承」，成為南洋土人尋

方因殖民緬甸而撼動滿清帝國權力結構，《點石齋畫報》所呈現南洋異域——緬甸的奇觀化文本，一方面順應全球觀視技術浪潮，向消費的大眾鋪展獵奇心理機制運轉下的博物知識，一方面則透過我族與他族的文化區辨，呈顯中國的道德和政治優位。Wen-huei Cheng[鄭文惠]，“視覺奇觀與權力地理——《點石齋畫報》緬甸的空間政治和文化敘事，” in *China and the World—the World and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Rudolf G. Wagner: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Natascha Gentz and Catherine Vance Yeh (Gossenberg: Ostasien Verlag, 2019), 109-133. 同樣地，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透過文字再現不夠文明或不夠中華，奇觀化和扁平化的南洋，可重演過去中原與南蠻文化位階不同的權力想像，將已然在西方殖民版圖、漸漸脫離中國朝貢制和土司制的南洋，作為呈顯中華民國中心位置的他者（空洞的能指），間接響應短暫的中國殖民南洋論。

⁶³ 老雄：〈馬來民族是華人後裔的傳說〉，《南洋研究》第2卷第5期（1929年），頁187。

根的對象；第二例，胡覺根遊記〈帝益族之村王〉，記錄他與印尼帝益族族長的對話，作者向族長講述外面商埠之華麗，建築物之宏偉，更單從彼此的膚色相近，而作出同種同源的判斷：「指余面及膚色與之較同異，而解釋，古代皆同一祖先之理。」⁶⁴作者宛如天啟者，一方面向封閉落後的帝益族，引介正在蓬勃發展中的現代文明，一方面替帝益族追本溯源，在陌生異域裡與他族建立未必可信的親屬關係，擴大中華民族的分布範圍；第三例〈麻李焚屍〉更有意思，作者到南洋的麻李島（疑似印尼Pulau Muari），記錄友人向他轉述的麻李土人貴族之葬禮儀式，友人意外聽到當地土人的葬禮祝文，猜測麻李島土人源自中國：「祝曰：願爾平安返唐山。其奇怪如此。……或曰：麻李之祖，乃來自中國者。」⁶⁵我們無法確定這個風土志中，當地土人是以中文還是土語念出「願爾平安返唐山」，這當中是否有錯譯的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段敘述依舊強調中國為根源，南洋為旁支的「根與徑」關係，製造南洋向中國認祖歸宗的機會。

上述這些案例積極探索「華／夷」之間的血緣連結，回應了同時間的「中華民族」公共論述。葛兆光曾梳理1920至1930年代中國學術界探討「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歷史脈絡，在面對日本和西方列強環伺的危機時刻，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主張抹除「漢族」和「夷狄」的界限，認定漢、滿、蒙、藏、回各族群乃出於同一血統和同一文化，共組名為「中華」的民族國家。即使當時有學人對這套「納四夷入中國」論述提出歷史考證上的疑義，但這些雜音很快被民族情感和國家意識的大聲響所掩蓋。⁶⁶《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的地誌書寫者也是出於相同理念來「納南洋入中國」，讓政權上不屬於中國

⁶⁴ 胡覺根：〈帝益族之村王〉，《南洋情報》第2卷第4期（1933年），頁213。

⁶⁵ 未標示作者：〈麻李焚屍〉，《南洋研究》第2卷第3期（1928年），頁133。

⁶⁶ 葛兆光：〈納「四裔」入「中華」？1920-1930年代中國學界有關「中國」與「中華民族」的論述〉，《思想》第27期（2014年12月），頁1-57。

的南洋，編入同一血脈之中，不斷往外擴張想像的大中華「殖民」版圖，抵抗現實裡讓中國疆域面臨萎縮的殖民帝國主義。

除了創造中華血緣無限蔓延的神話，另一種彰顯「華／夷」之間深度接觸的方式，是強調漢語華文的海外流播。王瑜（?-?）〈東京村民的一般習俗和情愛〉一文，考察東京三稜平原安南民族（今越南人）的民歌。文章一開始，作者花大篇幅地敘述安南語實受中文巨大的影響，惟他們語言的漢語元素，近年來被法國殖民者帶來的羅馬拼音逐步摧毀。不管如何，作者認為他們目前普遍使用的夷言胡語，都由「華」文所變，再度作出向中土溯本追源的敘述：

語言之遞嬗，雖受了不少時代的變異，但總有相承的線索可稽，安南的文字，既然受著中土這般重大的影響，故語言亦大半脫胎於中土，文雅的語言，固然是以中文為主，俚俗的語言，亦雅亦俗兼併，換句話說，即以本土的俚語，雜以中文遞變而來的語言，混合而成為一種普遍語言。⁶⁷

縱然作者知道安南語已與華語相距甚遠，安南人行文修辭和語法，也與一般中文寫作有所不同，但作者討論安南民歌時，很少關切語言的遞嬗過程，而是關注安南詩歌如何對應中國文學與文化，重「承」不重「變」，尋求兩地文學系統的相似性。在講述安南一首民歌時：「小姐，你的手臂，白像象牙／你的眸兒，人家說明利像切檳榔的刀子般樣／你的唇兒。嬌紅欲滴／你頭上的絲巾，像朵蓮花般樣！」（頁132）作者並未進一步分析歌謠所顯示南洋色彩的譬喻，而是直接聯想到中國古典意象：「形容得像傳說的月裏嫦娥般似」（頁132）。⁶⁸此外，作者更把中文在東方的地位，比擬為中世紀歐

⁶⁷ 王瑜：〈東京村民的一般習俗和情愛〉，《南洋研究》第4卷第2期（1931年），頁124。以下引文皆出自於此，不再贅註。

⁶⁸ 作者另舉一首鄙視男性的安南民歌，作者聯想到的是《紅樓夢》賈寶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之說，「其觀念雖沒有《紅樓夢》裏的賈寶玉那般利害，但也說得男性一文不值的了。」（頁135）

洲共用拉丁文的現象，認為受中文不同程度影響的東亞和東南亞社會，即使有各自不同的民族性，卻共享同一套社會道德標準和精神特質，「向後轉的生活（按：承襲傳統，懷想過去），是東方人唯一的本色」（頁139），建立東方一體想像，不停往外撐開華語漢字的影響範圍，與當代所謂「漢字文化圈」遙相呼應，布置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分庭抗禮的場面。

暨大南洋刊物不僅讓中文發揮連結漢語系與南島語系的「粘著劑」作用，還想以「國語」來凝聚南洋華人社會中不同方言群。如申鳳章（1889-1962）指出，南洋華僑不團結，蓋因語言隔閡太甚，因而須推動國語的普及化，重塑華僑的向心力。⁶⁹中國學人這種不管對內對外，都想把中文和國語推向最前線的舉動，蘊含國族衰亡的憂患意識，希望通過統一的語言，打通中華民族乃至於東方民族同喜同悲的情感領域，⁷⁰盡可能地積累壯大國勢的能量。

上述所列舉的文本，是從血緣和語言來模糊「華／夷」界限，將中國與南洋綁定一起。其他增強「華／夷」之間羈絆的風土表述，還包括向各地華人讀者群發掘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早向外移殖的證據，展示中國移民或難民的屍骨，已與南洋土地化為一體的遺跡。例如唐齋（?-?）〈中華民族發現新大陸的實證〉，認為墨西哥和南美厄瓜多國發現泥製古佛、中國結法的麻繩和漢朝古幣，判定中華民族比西方哥倫布更早一千年發現新大陸，⁷¹由此建立殖民史前史，宣稱海外殖

⁶⁹ 申鳳章：〈南遊觀感（下）〉，《南洋情報》第1卷第5期（1933年），頁192-193。另參孔繁禮：〈南遊回憶錄〉，《南洋情報》第2卷第2期（1933年），頁85-87。該文提及國語無法在南洋華人社會普及化，將影響祖國文化的灌輸。

⁷⁰ 參錢玄同（1887-1939）1920年代推動語言統一的國語運動的言論：「我們相信這幾年來的國語運動是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聖藥，因為有了國語，全國人民才能彼此互通情愫，教育才能普及，人們底思想才能自由表達。」錢玄同：〈發刊辭〉，《國語周刊》第1期（1925年），頁1。

⁷¹ 唐齋：〈中華民族發現新大陸的實證〉，《南洋研究》第2卷第5期（1929年），頁214。

民事業的起點在中國。《南洋研究》曾兩次刊載荷屬力利三里市發現前明古蹟武德將軍鄭公明（?-?）之墓的報導，推測此一南來的明遺民鄭公明為鄭成功（1624-1662）宗室，激起作者「追思往事，猶有餘通」的後遺民心理。⁷²更有意思的是蔚南（?-?）〈謁五兄弟墓〉，作者在印尼棉蘭參觀融合古風和夷風的華僑古墓：「墳式古雅，旁接祠宇，老椰古木，蒼鬱參天，臨風憑弔，不勝疇昔之感。」⁷³客死異鄉、被當地非我族類者欺凌的五名異姓華僑，深埋南洋多年，漸漸形成當地信仰，庇佑日後更多前來南洋開墾的華人，由此引出一段充滿血淚的南洋華僑墾殖史。

總言之，這些風土志作家為了強化中國與南洋的親密性，擴充「中華民族」勢力，因而發明（現）中原人士與南蠻土人混血的血緣傳說（種族史）、漢語散布東方的說辭（漢語史），以及華人開墾新大陸和南洋的遺址（移殖史和離散史），且只能是由華變夷，體現漢中心主義的南洋史觀。這些風土敘述，關鍵不在於真實性，而是為了支撐民族主義概念，它製造出中華民族具有「延續性」、「悠遠感」、「擴散力」的歷史幻覺。⁷⁴至於另一種相同功能的「被發明的傳統」，是鄭和的南洋風土傳說。

（二）鄭和創造南洋風土？

明代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的歷史事蹟和傳說故事，不斷在晚清民國報刊中複述，是「中國殖民南洋」立論一大基礎。1904年梁啟超

⁷² 特：〈荷屬飛拉頂發現中國古塚〉，《南洋研究》第2卷第2期（1928年），頁82；黃是因：〈南洋發現華人古墓 明武德將軍鄭公明之墓〉，《南洋研究》第3卷第1期（1930年），頁224。

⁷³ 蔚南：〈謁五兄弟墓〉，《南洋研究》第4卷第5、6期（1933年），頁24。

⁷⁴ 啟發自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之說，即一連串宣揚民族構成、看似源遠流長的事物，如民族史、國家象徵、母語、慶典儀式，都由歷史學家為了建立社會凝聚力、建構「民族國家」而創發的。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著，陳思文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年），頁11-25。

〈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一文，即已提示早期中國移民能在南洋稱王開墾，與鄭和（1371-1433）出使婆羅洲有關。1905年梁啟超再寫〈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先描述16世紀西歐展開殖民事業的大航海時代，再引出可與之媲美的「泰東大帝國的海上巨人」鄭和，敘述他更早地將中國勢力圈擴及「中國民族唯一之尾閭」的印度支那和南洋群島。⁷⁵這成為近代「中國殖民南洋論」的支撐點，彰顯昔日國民氣象之偉大，航海技術之先進，說服大眾今時移殖南洋之可能。其他晚清民國報刊，包括《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亦不停出現替鄭和立傳的文章，⁷⁶反覆提醒讀者中國向世界開放的海上歷史，召喚萬國朝貢、征撫諸番、宣揚國威的風光記憶，以這套雄渾的歷史敘述，快速地提振中華民族重返世界舞臺中心的信心，為「病體中國」一挽頹勢。理解這股「鄭和崇拜」熱潮的背景後，我們進一步觀察《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的地誌書寫中，有關鄭和創造南洋物產與指導蠻夷風俗的敘述。

第一則故事，是關於鄭和流放老虎與鱷魚到南洋。《南洋研究》的〈虎與鱷魚〉一文，講述馬來島土人開化之前，佛界的「三寶佛」以先知先覺身分降臨南洋，然而有佛身無佛心，竟把中原的老虎與鱷魚趕入南洋，以免這兩個猛獸貽害中國人。殊不知虎、鱷兩個外來物種犯起思鄉病，想重返祖國卻被「三寶佛」所拒，最後更因誤聽「三寶佛」的食物指引——臭狗和馬狗，而開始捕殺與之諧音的潮州人和馬交人（澳門，後泛稱廣東人），誤傷南來的華夏子弟。⁷⁷

⁷⁵ 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飲冰室專集》第4冊（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頁57-68。

⁷⁶ 如未標示作者：〈支那航海家鄭和傳〉，《大陸報》第11期（1903年），頁15-28；李長傳：〈鄭和小傳及其航行南洋之概略〉，《南洋研究》第3卷第6期（1931年），頁101-105；蔚南：〈鄭和開發南洋史略〉，《南洋情報》第1卷第2期（1932年），頁54-55；王珏：〈鄭和與南洋〉，《國立四川大學周刊》第2卷第16期（1933年），頁1-5。

⁷⁷ 未標示作者：〈虎與鱷魚〉，《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9年），頁120。這裡的三寶佛非指佛教的三身佛、縱三世佛或橫三世佛。從胡覺根〈由生

這個故事有若干重點：第一，鄭和在南洋有「神格化」的傾向，供奉他的寺廟在東南亞一帶林立，其神話傳說多出現於17世紀至19世紀這一華人大量移入馬來亞的時段，賦予鄭和開拓先驅的神明形象，象徵中國移民拓殖精神。⁷⁸不過，這個故事顯然也在消解鄭和的神聖性，強調他以中原為中心，為了維護中國內部安全，可犧牲掉海外番人的生命權益，因把他們視為無法對等看待的未開化民族；第二，自造一段具神秘色彩的物種源流敘述，本以為是南洋代表動物的老虎與鱷魚竟來自中原，讓中國介入南洋生態系統，南方雨林生物的起點，被有意標識在北方大陸；第三，作者以移動的獸隱喻中國移民，被動遷徙而犯相思病的虎與鱷，對應為了生計而前來南洋的中國移民，二者皆有回望祖國的流離心境。簡言之，這故事從未必為真的動物遷徙，既增強中國與南洋的聯繫，又從中表達具有種族歧視和眷戀大陸的中原中心主義。

這個將猛獸驅逐到邊緣，以解除中原危機的傳說，其實可在古典文獻中尋得原型（archetype），其原型更早地示範從「中原／邊緣」空間敘述，開展出「華夷之辨（變）」的辯證。《左傳》曾有一段記述：「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⁷⁹李惠儀曾對此一段落作出精彩獨到的解讀：

流四凶的故事，似乎嚴分華與夷、中央與邊鄙，使之聯繫秩序與失序、德行與過犯。但四凶又都是帝鴻氏、顓頊氏、少皞氏、緡雲氏之「不才子」，亦即表明四凶與主要氏族同

瓦至馬冷加由〉一文再度提到鄭和與鱷魚的故事，三寶佛應指三寶太監鄭和。有的口傳版本，直接講述三保公鄭和把鱷魚欺騙到南洋，解決昔時中國鱷魚為患的問題，卻禍害到當地的番人和華人。李永球：〈番與唐的故事〉，《星洲日報》第20版「星洲廣場·文化空間·田野行腳」，2007年2月25日。

⁷⁸ 安煥然：〈從開拓先驅到友好使者：馬來西亞華社的鄭和敘述〉，收於曾玲編：《東南亞的「鄭和記憶」和文化詮釋》（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48-69。

⁷⁹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上冊（臺北：中華書局，1993年），頁641。

源。……以四凶禦螭魅，即以之對抗更嚴重的威脅，似乎間接對中央秩序有貢獻。……據徐廣，四罪人調和華夷矛盾而建立靖亂的緩衝地。但無論四凶流四裔的經歷是他們的「蠻夷化」，還是邊緣化的「華化」，中央依舊是秩序根源，這秩序可以把華夷分際消融或使其極端化。⁸⁰

如上所述，李惠儀認為「流四凶」故事將出身於中原氏族的凶獸放逐到蠻夷戎狄四地，或有兩種不同意圖，要麼是讓具有威脅性的凶族「夷化」，進而「以蠻制蠻」，對付更具威脅的四裔，維繫中央政權所主導的天下秩序；要麼讓中原凶族「華化」邊緣四裔，同樣也是替中原調和華夷矛盾。⁸¹前面所述的三寶佛故事，置換四凶為虎鯀，一樣將凶獸放逐到蠻夷之地。雖然沒有明言借兩個中原凶族來抵禦或教化南方蠻族，而只是轉移中原的危險，但目的都是為了表明中央是秩序的根源，中央有「以華變夷」或「以夷制夷」的職責，華夷之間是有滑動的可能：中國之物變為南洋之物，南洋風土被華化，主動方為華，被動方為夷。

第二則故事，是關於鄭和排遣出南洋土產榴槿。《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雖暫時未見完整的鄭和與榴槿的風土傳說，但在胡覺根〈由生瓦至馬冷加由〉有一筆帶過部分南洋華人相信榴槿乃由中國神人帶來的無稽之談：「榴連菓之特生於南洋，非由支那神人命之來也，爾可宣傳於群眾，勿為古之妄言者欺。」⁸²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曾記錄蘇門答刺國的榴槿：「有一等臭果，

⁸⁰ 李惠儀：〈華夷之辨、華夷之辯：從《左傳》談起〉，《嶺南學報》第13輯（2020年12月），頁43。

⁸¹ 張其賢認為周代把凶族（按：作者解釋四凶為被投諸四裔、具周人血統的罪人）遷徙到聖王政治勢力範圍以外的四裔之說，有可能代表蠻、夷、戎的人群裡已混入周人，華夷的界限從來都不是分明的。張其賢：《「中國」概念與「華夷」之辨的歷史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頁85-93。

⁸² 胡覺根：〈由生瓦至馬冷加由〉，頁400。

番名賭爾焉。如中國水雞頭樣，長七、八寸，皮生尖刺，熟則五、六瓣裂開，若臭牛肉之臭。內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塊，甚甜美好吃。肉中有子，炒而食之，其味如栗。」⁸³這裡可見現實中鄭和航行隊伍遇見的榴槿，早已被當地人命名和廣泛食用。不過，南洋民間卻普遍流傳榴槿的生成傳說，即榴槿由鄭和的屎尿所化，有的表示是為了懲罰得罪鄭和的爪哇土人，有的認為純粹是鄭和向南洋土著惡作劇，未想土人竟毫無抗拒，以臭為香。⁸⁴

這種惡趣味的口傳故事，固然顯示一種文化優越感，突顯土人的民智未開，完全被中國人玩弄於股掌之中。然而，我們還可從中國變化神話的敘事傳統加以詮釋。據李豐楙所述：「民間對於動植物的源始，採用解說性神話加以思維，不僅古神話時代有之，就是後世也會繼續創造出來，而其相關的人物也常會因地域性而集中於一些箭垛式人物之上，……。」⁸⁵鄭和屎尿生成榴槿之說，也是沿用這種構成地方（place）的操作方法，南洋華人將當地物產的起源，歸結到比他們更早下南洋的鄭和身上，使之成為具有地域指標性，無限容納移民情感和風物想像的「箭垛式人物」。縱然鄭和只是短暫逗留南洋，仍被口傳者看作南洋風土另類的造物者。其非出自善意，甚至帶有羞辱性的造物動機，一方面突顯中國人已在這熱帶南方留下生命痕跡，南洋為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一方面從當地土人把中國人排泄物當作珍饈的幻想中，建立「華／夷」高低分明的文化位階。

第三則故事，是孔繁禮〈南遊回憶錄〉述及馬來人的禁食節（Puasa，伊斯蘭齋月），也是由鄭和所指導。⁸⁶此文和其他禁食節來

⁸³ 馬歡著，萬明校注：《瀛涯勝覽》（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頁46。

⁸⁴ 鄭鶴聲蒐集1920年至1930年代中國的南洋遊記和報紙所記載各種南洋榴槿傳說版本，見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臺北：中華書局，1978年），頁176。

⁸⁵ 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臺北：中華書局，2010年），頁119。

⁸⁶ 孔繁禮：〈南遊回憶錄〉，《南洋情報》第2卷第5期（1933年），頁276-277。

由的口傳版本一樣，沒有特別闡釋此一伊斯蘭教習俗，是否可聯繫到鄭和早年的回教徒身分，而是跟前面兩則風土傳說類似，講述鄭和故意欺騙當地土人，目的是弱化他們的身體，遵循「弱肉強食」進化論原則，自行淘汰認為智力更低的人種。庶民視野下的鄭和形象，對南島語系民族充滿強烈敵意，跟前文提及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打造和平、光明、威武的鄭和形象，大相徑庭。這種通過毀滅和侮辱異族方式建構的風土偽知識，反映實際生活當地、與異族直接接觸，並有一層競爭資源關係的口傳者（中國移民），對於異域他者（the other）有所隔閡、恐懼，乃至於厭惡的排斥心理，擺出任意主宰南洋的高姿態，戲夷滅蠻，隱約曝露將南洋占為已有的野心。

有意思的是，《南洋情報》中有人戳破了鄭和創造南洋風土的謊言。遊走於東婆羅洲河流域的胡覺根，一方面肯定鄭和比歐洲人更早盤踞南洋的風光景象：「歐洲人未到之前，鄭和之名，已震過南土，其兵力亦佈及各島。」⁸⁷一方面當場質疑當地船夫講述的鄭和與鱷魚神話：「中華人自古即為巫來由之良友，互相親愛若手足兄弟，三寶即最著者之一。鱷魚為熱帶自有之產物，如榴連菓之特生於南洋，非由支那神人命之來之，爾可宣傳於群眾，勿為古之妄言者欺。」⁸⁸這再度說明一個事實，我們前面所看到一連串從中土到南蠻、由源至流、以華變夷的南洋風土敘述，都是「被發明」、不可靠的歷史記憶，目的是綁定中國與南洋，指示南洋的一切源頭在中國，南洋是中國的延伸，迎合「中國殖民南洋論」的政治話語。胡覺根的文章，理性地揭示此一風土記憶的虛構性，深知這是借鄭和來表達「華／夷」聯繫的途徑。⁸⁹

⁸⁷ 胡覺根：〈步行丁加郎一帶〉，頁276-278。

⁸⁸ 胡覺根：〈由生瓦至馬冷加由〉，頁400。

⁸⁹ 從上一章節的劉士木到這一章節的胡覺根，都不會直觀地貶低南洋生活習慣，或盲目地相信鄭和的南洋風土傳說，體現出客觀性和反省力。事實上，目前尚未在《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內找到任何文章直接表明南洋風土書寫，純粹為了響應「中國殖民南洋論」。將南洋地誌書寫的華夷

四、結語

以上我們看到1920年代至1940年代《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的南洋地誌書寫，一邊重繪又一邊擦拭「華／夷」界限，配合「中國殖民南洋論」，於國難當前之時，重構將南洋群島收編在內的天下觀，稍稍緩解中國知識分子們集體的憂患愁緒。

這群南洋地誌書寫者，經常有意無意地向讀者展現從中原看南洋，又從南洋回望中原的視域。這群心向中國的書寫南洋者，不時調動大量熟悉的古典文學資源，描述眼前的南方異域。例如上海《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的幾篇遊記，南遊作家挪用桃花源的空間意象，召喚昔日貶謫文人的登高記憶，輸入到南洋地景之中。曹仲淵〈蘇門答臘火山遊記〉曾寫道：

行行重行行，經過無數避暑山莊，及小小村落，數不盡山坡草場，行不盡泥塗土徑，識不盡野草閒花，看不盡山居奇景，……既抵山麓，犬吠雞鳴，流泉之聲，土人耕作之聲，行經田園園丘，野草沒脛，阡陌皆不甚整齊，……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⁹⁰

作者使用排比手法「數不盡……行不盡……識不盡……看不盡……」營造一股古典氛圍，通過古詩文句描述蘇門答臘的登高體驗。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取材於〈桃花源記〉，對南洋作出安逸自足的田園描寫，彷彿南洋是尚未受到現代化和戰爭暴力的遠古村野，遠離現時中國戰場。滄海餘生〈東南洋漫遊隨筆〉遊歷馬來半島太平湖時，將太平湖看作「楚之雲夢」，聯想蘇東坡（1037-1101）瀏覽廬

之辨（變），視為當時「中國殖民南洋論」的即時回應，乃由本文自行提出。因此，出現異質、雜質的聲音，其實更符合現實狀況，不可能大家出於同一目的和眼光來審視南洋風土，不過呼應「中國殖民南洋論」的風土敘述仍占大多數。

⁹⁰ 曹仲淵：〈蘇門答臘火山遊記〉，頁108-109。

山時寫下的〈題西林壁〉詩句：「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總不同」，⁹¹並化用柳宗元（773-819）〈始得西山宴遊記〉結尾，在遊覽中感到「悠然神往，冥物我而與之俱化」。⁹²縱然作者藉由上述古詩文描繪南洋絕美景緻，但〈題西林壁〉和〈始得西山宴遊記〉都是蘇柳二人被貶謫期間所寫，南洋對應到古代罪臣文人的放逐之地。作者自覺或不覺地想效仿古人在異地發現具有啟示性的山明水秀，尋求精神上自我超越，卻隱隱然透露一種鬱鬱不得志的悲情，回望此時間題叢生的中原。

將這種抑鬱的家國情緒表現得最直接的，是孔繁禮〈南遊回憶錄〉，在南洋遊記中賦詩一首：「椰梢新月半分明，處處蕭聲雜『梵林』（按：小提琴）；巫女（按：巫來由民族）不知亡國恨，甜歌悠自唱昇平。」⁹³這顯然仿造杜牧（803-852）〈泊秦淮〉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⁹⁴南洋的相對安逸，挑起作者的家國情懷，回眸凝望北方大陸搖搖欲墜的國體。易言之，這些短暫南遊的中國學人，多從南洋地景，鏈接到過去中國的貶謫文學與亡國之音。⁹⁵尚未捲入太平洋戰爭的南洋，其風平浪靜和歌舞昇平，反襯中

⁹¹ 蘇軾著，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第2冊（臺北：莊嚴出版社，1990年），卷24〈題西林壁〉，頁1219。

⁹² 滄海餘生：〈東南洋漫遊隨筆〉，《南洋研究》第1卷第5期（1928年），頁103-106。

⁹³ 孔繁禮：〈南遊回憶錄〉，《南洋情報》第2卷第2期（1933年），頁85-87。

⁹⁴ 杜牧著，何錫光校注：《樊川文集校注》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泊秦淮〉，頁409。

⁹⁵ 除了引用中國古詩詞，《南洋研究》和《南洋情報》一些風土志還會以中國史傳或古典小說的論贊形式，進行政治時事評論。如「劍」在《南洋研究》的風土隨筆，寫完南洋物產、風俗習慣或趣聞後，最後以「俠劍曰」作出評論。如〈強盜蟹〉，作者介紹完東南亞寄居蟹後，批判南洋被殖民實況，暗中感嘆中國此時漸被西方列強侵略的國難時局：「俠劍曰：現世公定之法律，皆以物非己有，未得物主之同意允許而取之者，皆認此種手段為盜。犯盜者罪，惟盜國者不受罪，而反得主；余真不解。」劍：〈強盜蟹〉，《南洋研究》第2卷第3期（1928年），頁86。

國的波濤洶湧和四面楚歌，南洋地誌書寫隱含深層的憂患意識，終極關懷點仍是那暫時遠離又充滿苦難的大陸。

本文議題仍有若干拓展之處：其一，這一中國境內的南洋地誌書寫風潮，後來延伸到南洋當地報刊界。因戰後過去一群在中國研究南洋的文人，如劉士木、姚楠、張禮千（1900-1955）和許雲樵（1905-1981）等，紛紛南來新馬，不僅參與《星洲日報·南洋研究》副刊寫作，還成立新加坡南洋學會，帶動星馬一帶東南亞研究風氣。抗戰期間和二戰結束後，新加坡曾發行《南洋週刊》（1939-1946），開闢當地文藝欄位和刊載風土寫作。新加坡南洋學會成員之一的南來作家許雲樵，則於1946年至1948年間在馬來亞主編《南洋雜誌》。馬來西亞最長壽的華文文藝刊物《蕉風》（1955-），草創時期也特別設置「采風」欄位、連載一系列南洋風俗隨筆和譯介馬來歷史傳說，寫作者多為中國南來的知識分子。因此，戰前戰後的南洋地誌書寫，二者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承續和斷裂？又顯現出怎樣不同的身體感和認同感？這或是值得追蹤的問題。其二，《南洋研究》之前，北京何海鳴創辦的《僑務旬刊》（1921-1924）同樣關注南洋華僑問題。而1926年蘇門答臘發行《南洋時事匯刊》，所刊載的一些風俗隨筆和竹枝詞，後來都被《南洋研究》複製拼貼。換句話說，這些比《南洋研究》更早的中國和東南亞當地報刊，是如何從不同立場和視角再現出南洋，引出疆域、民族、中國性與本土性等問題，亦有待深論。

徵引書目

- 〈編輯者言〉，《良友》第158期，1940年9月，無頁碼。
- 孔繁禮：〈南遊回憶錄〉，《南洋情報》第2卷第1期，1933年。
- 孔繁禮：〈南遊回憶錄〉，《南洋情報》第2卷第2期，1933年。
- 孔繁禮：〈南遊回憶錄〉，《南洋情報》第2卷第5期，1933年。
- 王 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年。
- 王 珏：〈鄭和與南洋〉，《國立四川大學周刊》第2卷第16期，1933年。
- 王 瑜：〈東京村民的一般習俗和情愛〉，《南洋研究》第4卷第2期，1931年。
- 王維駟：〈檳榔嶼之海參〉，《南洋情報》第1卷第8期，1933年。
- 王德威：〈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中國現代文學》第34期，2018年12月，頁1-28。
- 王賡武著，姚楠編：《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6年。
- 付成雙：〈處女地假說與北美印地安人的命運〉，《史學集刊》第2期，2021年3月，頁56-71。
- 申鳳章：〈南遊觀感（下）〉，《南洋情報》第1卷第5期，1933年。
- 未標示作者：〈支那航海家鄭和傳〉，《大陸報》第11期，1903年。
- 未標示作者：〈南洋土會避刃術〉，《南洋時事彙刊》第1卷第10、11合刊，1926年。
- 未標示作者：〈爪哇土人割禮遊行記〉，《南洋時事彙刊》第1卷第10、11合刊，1926年。
- 未標示作者：〈馬來半島巨蛇嚙物後之狀態〉，《南洋研究》第1卷第3期，1928年。

- 未標示作者：〈印度人之弄蛇者〉，《南洋研究》第1卷第5期，1928年。
- 未標示作者：〈麻李焚屍〉，《南洋研究》第2卷第3期，1928年。
- 未標示作者：〈虎與鱷魚〉，《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9年。
- 未標示作者：〈南洋土著避刃術〉，《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9年。
- 未標示作者：〈爪哇土人割禮遊行記〉，《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9年。
- 未標示作者，顧因明譯：〈揮國徒步旅行記〉，《南洋研究》第3卷第6期，1931年。
- 未標示作者：〈越南之獠民〉，《南洋情報》第1卷第6期，1933年。
- 未標示作者：〈東北特產〉，《東方雜誌》第30卷第11期，1933年。
- 伍鐵平：〈「處女（的）」的轉義及其同文化的關係〉，《四川外語學院學報》第72期，1999年，頁102-105。
- 安煥然：〈從開拓先驅到友好使者：馬來西亞華社的鄭和敘述〉，收於曾玲編：《東南亞的「鄭和記憶」和文化詮釋》，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48-69。
- 江應梁：〈華僑與土人同化問題〉，《南洋情報》第1卷第2期，1932年。
- 江應梁：〈救僑應從灌輸文化入手〉，《南洋情報》第1卷第5期，1933年。
- 米樂（J. Hillis Miller）著，單德興編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臺北：書林出版社，1995年。
- 老 雄：〈馬來民族是華人後裔的傳說〉，《南洋研究》第2卷第5期，1929年。
- 杜牧著，何錫光校注：《樊川文集校注》上冊，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
- 低能兒：〈微露一抹紅牆〉，《南洋研究》第2卷第1期，1928年。

- 低能兒：〈嘗榴蓮〉，《南洋研究》第2卷第1期，1928年。
- 吳春明、王櫻：〈「南蠻蛇種」文化史〉，《南方文物》第2期，2010年6月，頁89-102。
- 志宏：〈馬來群島之Sakai人〉，《南洋研究》第1卷第3期，1928年。
- 李永球：〈番與唐的故事〉，《星洲日報》第20版「星洲廣場·文化空間·田野行腳」，2007年2月25日。
- 李長傳：〈鄭和小傳及其航行南洋之概略〉，《南洋研究》第3卷第6期，1931年。
- 李長傳：《中國殖民史》，收於周谷城編：《民國叢書第二編》第26卷，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
- 李盈慧：〈中國視野中的南洋觀：1945年以前的暨南大學與南洋研究〉，收於李志賢編：《南洋研究：回顧、現狀與展望》，新加坡：南洋學會，2012年，頁69-90。
- 李惠儀：〈華夷之辨、華夷之辯：從《左傳》談起〉，《嶺南學報》第13輯，2020年12月，頁19-50。
- 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臺北：中華書局，2010年。
- 沈美鎮：〈婆羅洲土人的風俗〉，《南洋研究》第3卷第4期，1931年。
- 和辻哲郎著，朱坤容譯：《風土：人間學的考察》，北京：東方出版社，2017年。
- 松內冷洋著，李耀商譯：〈遊歷南洋以後〉，《南洋研究》第3卷第6期，1931年。
- 林尹註譯：《周禮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 林津如：《女性主義與流變——後殖民女性主義》，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9年。
- 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晚清民族主義形成的中間環節〉，《二十一世紀》第94期，2006年4月，

頁40-53。

俞君適：〈南遊鱗爪〉，《南洋研究》第7卷第2期，1937年。

胡覺根：〈步行高低河流域各埠記〉，《南洋情報》第1卷第4期，1933年。

胡覺根：〈步行高低河流域各埠記（續）〉，《南洋情報》第1卷第5期，1933年。

胡覺根：〈步行丁加郎一帶〉，《南洋情報》第1卷第7期，1933年。

胡覺根：〈步行生瓦生瓦〉，《南洋情報》第1卷第8期，1933年。

胡覺根：〈由生瓦至馬冷加由〉，《南洋情報》第1卷第10期，1933年。

胡覺根：〈帝益族之村王〉，《南洋情報》第2卷第4期，1933年。

胡覺根：〈帝益族之歌舞〉，《南洋情報》第2卷第5期，1933年。

胡覺根：〈帝益族之奇俗〉，《南洋情報》第2卷第6期，1933年。

姚 瑞：〈暨南大學《南洋研究》的辦刊歷程及研究貢獻〉，《廣東開放大學學報》第28卷第5期，2019年，頁34-37。

姚 瑞：〈《南洋研究》中的華僑教育思想〉，《海峽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頁31-35。

夏 菁：《慾望與思考之旅——中國現代作家的南洋與英美遊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

唐 齋：〈中華民族發現新大陸的實證〉，《南洋研究》第2卷第5期，1929年。

特：〈荷屬飛拉頂發現中國古塚〉，《南洋研究》第2卷第2期，1928年。

耿素麗、章鑫堯彙編：《南洋史料》，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

馬歡著，萬明校注：《瀛涯勝覽》，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

張一帆：〈蚊亂印象記〉，《南洋情報》創刊號，1932年。

張其賢：《「中國」概念與「華夷」之辨的歷史探討》，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張惠思：〈跨文化行旅、異域新知與啟蒙意識——中國南來文人的馬來亞遊記與雜錄寫作（1915-1937）〉，收於何昆益編：《五四精神在東亞的發展與變遷暨跨文化研究》，花蓮：慈濟大學，2017年，頁313-345。

曹仲淵：〈蘇門答臘火山遊記〉，《南洋研究》第1卷第2期，1928年。

梁啟超：《飲冰室專集》第4冊，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

莊學本：〈今日之吐蕃民族：一個男惰女勤的社會〉，《良友》第112期，1935年。

許紀霖：〈天下主義／夷夏之辨及其近代的變異〉，《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頁66-75。

許傑：《椰子與榴槤》，上海：現代書局，1931年。

陳嶺：〈「反殖」與「殖民」：中國本土化南洋觀和「殖民」話語建構——暨南大學的南洋書寫（1927-1937）〉，《東南亞研究》2021年第1期，頁130-151。

無名氏：〈爪哇舞〉，《南洋研究》第1卷第5期，1928年。

黃是因：〈南洋發現華人古墓 明武德將軍鄭公明之墓〉，《南洋研究》第3卷第1期，1930年。

黃國華：〈民國的南洋：上海《良友》畫報的「南洋群島」想像〉，《中國現代文學》第40期，2021年12月，頁151-177。

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縣：立緒文化，1999年。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上冊，臺北：中華書局，1993年。

滄海餘生：〈東南洋漫遊隨筆〉，《南洋研究》第1卷第5期，1928年。

滄海餘生：〈東南洋漫遊隨筆（續）〉，《南洋研究》第2卷第2期，1928年。

葛兆光：〈天崩地裂——中國古代宇宙秩序的建立與坍塌〉，《葛兆光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 葛兆光：〈納「四裔」入「中華」？1920-1930年代中國學界有關「中國」與「中華民族」的論述〉，《思想》第27期，2014年12月，頁1-57。
- 廖文輝：《馬新史學80年：從「南洋研究」到「華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
- 暨南大學校史編寫組編：《暨南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 瑪麗·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著，方傑、方宸譯：《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
- 劉士木：〈瓜哇土人奇特的餽饌〉，《南洋情報》第1卷第3期，1932年。
- 劉士木：〈南洋叢談〉，《南洋情報》第1卷第9期，1933年。
- 劍：〈食鱷〉，《南洋研究》第2卷第3期，1928年。
- 劍：〈強盜蟹〉，《南洋研究》第2卷第3期，1928年。
- 劍：〈懶漢之道理〉，《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9年。
- 潮州峇峇：〈榴槤季節話榴槤〉，《蕉風》第17期，1956年7月，頁1。
- 蔚南：〈鄭和開發南洋史略〉，《南洋情報》第1卷第2期，1932年。
- 蔚南：〈謁五兄弟墓〉，《南洋研究》第4卷第5、6期，1933年。
- 鄧津華著，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年。
- 鄭洪年：〈發刊詞〉，《南洋研究》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
- 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臺北：中華書局，1978年。
- 學潛：〈檳榔嶼之華僑婦女〉，《南洋研究》第3卷第1期，1930年。
- 錢玄同：〈發刊辭〉，《國語周刊》第1期，1925年，頁1。
-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著，陳思文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年。
- 鍾怡雯：〈中國南遊（來）文人與馬華散文史〉，《中國現代文學》

第25期，2014年6月，頁161-175。

鍾怡雯：《后土繪測：當代散文論II》，臺北：聯經，2016年。

顏 敏：〈民國南洋學的幾種話語（1912-1949）〉，《東南亞研究》2011年第1期，頁90-94。

魏覺中：〈巴布亞島加雅人的生活概況〉，《南洋研究》第3卷第4期，1931年。

覺 中：〈南遊拾零〉，《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9年。

蘇軾著，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第2冊，臺北：莊嚴出版社，1990年。

Chen Ying：《現代中國知識譜系中的南洋（1911-1937）》，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博士論文，2018年。

Irving M. Smith著，王且華譯：〈婆羅洲中部航海記〉，《南洋研究》第2卷第2期，1928年。

A correspondent. "Colonization of N. Manchuria: Major Palmer's Ranch of Virgin Lan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0 May, 1925, 7.

Cheng, Wen-huei [鄭文惠]. "視覺奇觀與權力地理——《點石齋畫報》緬甸的空間政治和文化敘事." In *China and the World—the World and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Rudolf G. Wagner: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Natascha Gentz and Catherine Vance Yeh, 109-133. Gossensberg: Ostasien Verlag, 2019.

Gladney, Dru C.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no. 1 (February 1994): 92-123.